

F062-6/94

高春芽 ● 著

Lixing De Ren

理性的人 与非理性的社会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研究

Ren Jitixing De Shehu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高春芽◎著

Lixing De Ren

理性的人 与非理性的社会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研究

Yu Felixing De Shehu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性的人与非理性的社会：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研究/高春芽
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004-7875-1

I. 理… II. 高… III. 公共选择(经济学) IV. F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2880 号

责任编辑 王 茵
特邀编辑 王玉敏
责任校对 王光兴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6.5 插 页 2

字 数 422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思想渊源与方法论特征	(26)
第一节 集体行动的概念与模式	(26)
一 集体行动的概念	(27)
二 集体行动的模式	(29)
第二节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思想渊源	(31)
一 西方学者对集体行动理论的探索	(31)
二 奥尔森提出集体行动理论的条件	(43)
第三节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方法论特征	(49)
一 方法论个人主义	(50)
二 理性人假设	(53)
三 集体行动理论方法论与“包容经济学”	(60)
第二章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64)
第一节 集团与集体行动的逻辑	(65)
一 集团与集团分类	(66)
二 集体行动的逻辑	(78)
第二节 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	(84)
一 独立行为与集体物品的自愿供给	(87)
二 联合行为与集体物品的自愿供给	(98)

2 理性的人与非理性的社会

三 集团规模与社会激励·····	(108)
四 集体物品供给水平的观点论争·····	(112)
第三节 集团非对称性与集体行动·····	(114)
一 集团非对称性与“小成员剥削大成员”·····	(114)
二 集团非对称性、集团规模和集体行动·····	(122)
第四节 制度设计与集体行动·····	(127)
一 选择性激励的含义·····	(127)
二 选择性激励的制度安排·····	(128)
三 选择性激励的分类及其实施机制·····	(130)
四 选择性激励思想之比较:奥尔森与巴纳德·····	(133)
第五节 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选择性激励之外的视角·····	(136)
一 俱乐部理论与集体行动·····	(136)
二 政治企业家理论与集体行动·····	(139)
三 合作演化理论与集体行动·····	(143)
四 社会资本理论与集体行动·····	(150)
五 集体行动理论的两种传统·····	(155)

第三章 “副产品”理论与现代集团理论的发展:奥尔森的

利益集团发生论·····	(158)
第一节 早期学者对利益集团形成机制的探索·····	(159)
一 麦迪逊的贡献·····	(159)
二 托克维尔的贡献·····	(159)
三 本特利的贡献·····	(160)
四 杜鲁门的贡献·····	(162)
五 多元主义集团理论·····	(164)
第二节 利益集团形成机制的“副产品”理论·····	(167)
一 “副产品”理论的具体内容·····	(167)
二 “副产品”理论对集团理论的贡献·····	(171)
第三节 “副产品”理论的困境及其发展·····	(183)
一 “副产品”理论的困境·····	(183)
二 “副产品”理论的发展·····	(196)

三	利益集团形成理论的综合发展·····	(203)
第四章	利益集团、集体行动与制度僵化:奥尔森的	
	利益集团功能论 ·····	(206)
第一节	时空维度中的集体行动与制度僵化·····	(206)
一	社会演化视角下的集体行动的逻辑·····	(207)
二	制度僵化: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209)
第二节	政治稳定与动态利益集团形成理论·····	(215)
一	动态利益集团形成理论·····	(215)
二	动态利益集团形成理论的内在困境·····	(217)
第三节	利益集团集体行动的激励机制·····	(224)
一	社会协商与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激励·····	(224)
二	经济增长与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激励·····	(231)
第四节	狭隘利益集团、寻租与经济停滞·····	(239)
一	阻碍经济增长的狭隘利益集团·····	(239)
二	狭隘利益集团促动下的再分配:寻租·····	(245)
三	奥尔森寻租思想的特征及其局限·····	(257)
第五节	相容利益集团、合作主义与经济增长·····	(272)
一	相容利益集团及其行动激励·····	(273)
二	合作主义视野中的相容利益集团及其经济绩效·····	(279)
第六节	走出制度僵化的困境:破除利益集团网络·····	(303)
一	利益集团力量的空间限制:管辖权统一·····	(304)
二	利益集团滋生的干扰机制:政治动荡·····	(307)
三	国家兴衰的集体行动机制·····	(322)
第五章	强化市场型政府、集体行动与社会繁荣 ·····	(329)
第一节	专制政府与社会繁荣·····	(329)
一	奥尔森的专制国家理论·····	(330)
二	专制政府中的相容利益与社会繁荣·····	(341)
第二节	民主政府与社会繁荣·····	(347)
一	民主政府的含义和民主政府的起源·····	(347)

4	理性的人与非理性的社会	
二	民主政府中的相容利益与社会繁荣	(353)
第三节	强化市场型政府与社会繁荣	(365)
一	市场与社会繁荣	(365)
二	强化市场型政府促进社会繁荣	(368)
三	转型国家的民主化及其经济效应	(374)
结语	市场与政府关系中的利益集团与集体行动	(381)
参考文献		(386)
后记		(417)

导 论

曼瑟·奥尔森 (Mancur Olson) 于 1932 年 1 月 22 日出生在美国北达科他州的格兰德福克斯市。他来自一个“左翼”的农场主家庭，其祖上为挪威移民，所以奥尔森自称为北欧日耳曼人的后裔。奥尔森分别于 1954 年、1960 年和 1963 年获得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学士学位、英国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和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奥尔森于 1961~1963 年在美国空军服兵役。奥尔森于 1963~1967 年任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但普林斯顿大学并没有授予其终身职位。1967~1969 年，奥尔森暂时中断了大学研究生生活，在林登·约翰逊总统任期内担任美国联邦政府卫生部的公务员。自 1969 年起，奥尔森长期执教于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系，直至于 1998 年 2 月 19 日逝世。

1998 年 3 月 7 日，英国著名经济学刊物《经济学家》发布了奥尔森的讣告，称颂奥尔森为“特殊利益集团的鞭挞者”。《经济学家》对奥尔森一生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果奥尔森还活着，集体行动理论可能为他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这并非毫无争议^①。美国经济学刊物《公共选择》也发布了詹姆斯·埃尔特撰写的讣告，标题为《曼瑟·奥尔森对于政治科学的贡献：1932—1998》。^② 从讣告中可以看出逝者一生最杰出的贡献，但上述两个讣告对奥尔森的评价各有侧重，前者侧重突出奥尔森

① *The Economist*, March 7th, 1998, p. 107.

② James Alt, "Thoughts on Mancur Olson's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1932—1998", *Public Choice*, No. 98, 1999, pp. 1—4.

在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成就，而后者侧重突出奥尔森在政治学领域取得的成就。这或许可以说明，奥尔森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都取得了专业学者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

虽然奥尔森一生的学术研究都和经济学联系在一起，但他的视野从未局限于任何单一的学科。奥尔森曾经说过：“寻找有趣和重要的问题，永远不要在乎它如何分类并解决它。这就是我对自己的忠告，也是我对其他每个人的忠告。”^① 在家庭背景的熏陶下，奥尔森少年时代就对政治事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奥尔森回忆，他早年的梦想是成为政治家而非经济学家，但这个梦想被大学生活所改变。奥尔森阅读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有关公共物品的文章，这不仅激发了奥尔森从事研究工作的兴趣，而且促使他思考自己身边的现实问题：农场主如何自我组织以维护其共同利益？这其实就是奥尔森后来长期关注的集体行动问题。在牛津大学期间，奥尔森接受了正规的政治史和哲学方面的训练；在哈佛大学期间，他受益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对政治问题的兴趣，对社会科学的广泛涉猎，以及接受了专业的经济学训练，这些均影响了奥尔森学术研究的途径和旨趣。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引起了广泛讨论，有力地推动了二十世纪集团理论的发展。虽然他在集团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种成就长期没有在政治学界得到应有的认可和重视。埃尔特痛心疾首地指出，美国1975年出版的多卷本《政治学手册》几乎没有承认甚至回避奥尔森对集团理论的贡献^②。对于职业经济学家奥尔森而言，其理论得到其他学科认可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奥尔森最终成功地到达了目的地。根据1994年国际政治科学联合会第十六次世界大会的统计数据，《集体行动的逻辑》

① Mancur Olson, "Economy, Logic and Action", *Society*, Vol. 27, No. 3, 1990, p. 79.

② James Alt, "Thoughts on Mancur Olson's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1999", pp. 1-2. 格林斯通在中文版《政治学手册精选》“集团理论”部分论述了美国集团理论的发展历程。他细致地评述了本特利、杜鲁门、达尔、麦康奈尔和路威这些政治学学者的集团理论，而对于奥尔森的集团理论则没有详述。参见〔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王沪宁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81页。

是西方政治学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三部著作之一^①。奥尔森生前所在的马里兰大学为了推动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发展，成立了“集体选择研究中心”（The Collective Choice Center，简称 CCC）。此研究中心设在政治学系，并由一位政治学家负责该中心的领导工作^②。由此可以看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已经超越了经济学学科的界限，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麦克林甚至认为：“奥尔森的著作虽非完美无缺，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科学。”^③

一 研究定位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理性选择研究在政治学领域迅速发展。研究者将经济学方法引入政治过程分析，提出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型理论，其中包括以奥尔森为代表的集体行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与调整，它系统地论证了社会群体的组织过程及其行动倾向。现如今，集体行动理论广泛运用于社团治理、群体性事件、社会运动、公共资源保护、国际合作等研究领域，为人们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围绕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产生了各种争论，有的称他为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的给他贴上新政治经济学的标签，还有的声称其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一员。托马斯·谢林甚至认为：“奥尔森并不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的专业是政治理论。奥尔森使用了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研究的却

① 199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政治科学新手册》，这本书概览了美国政治学各子学科100多年来的发展状况。根据1630名学者撰写的3403本学术书籍，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成为引用次数排名第二的著作。详见〔美〕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乐·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上册），钟开斌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8页。

② Jac C. Heckelman and Dennis Coates, *Collective Choice-Essays in Honor of Mancur Olson*, New York: Springer, 2003, p. 8.

③ Iain Mclean, "The Divided Legacy of Mancur Ols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0, No. 4, 2000, p. 667.

是政治现象。”^①造成众说纷纭的主要原因在于，学术界在概念使用上并不统一，这些学派的研究范畴本来就相互重叠。奥尔森认为，自己从事的集体选择研究拥有多个名称，比如公共选择、社会选择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等^②。奥尔森在一生的研究中跨越了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涉足了集体行动、集体行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社会繁荣的制度基础等不同问题，上述“标签”都可以从特定的角度突出奥尔森在某一阶段、某一领域的方法论特征或研究倾向。总体而言，奥尔森使用的方法论和关注的研究对象决定了他和公共选择学派具有亲缘关系，所以，国外的研究者大多将其定位为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奥尔森对此也没有表示异议^③。但从奥尔森的著述中可以发现，他同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的学者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理论家一般认为“强政府是必要的恶”，对政府的职能持有怀疑态度。而奥尔森认为自由市场的功能是有限的，他赋予政府消除外部性和降低不确定性的积极角色。正是由于此间的差异，奥尔森更倾向于使用中性色彩的概念“集体选择”（collective choice）而非“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④。公共选择学派区分了由市场提供的私人物品和由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物品，奥尔森对这种分类方式提出了质疑。公共物品意味着由公共部门——政府提供的服务，而事实上利益集团和社会组织也参与供给公共物品，奥尔森建议以“集体物品”（collective goods）代替“公共物品”（public goods）^⑤。从对理性分析方法运用的角

① Wallace Oates, Joe Oppenheimer and Thomas Schelling, “Remembering Mancur Olson”,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66, No. 3, 2000, p. 798.

② Mancur Olson, “The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 Collective Choice Approach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ristopher Clague (ed.),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8.

③ 根据奥尔森曾经指导过的中国经济学学者张宇燕的回忆，他曾经把公共选择学派划分为以布坎南、斯蒂格勒和奥尔森为代表的三个流派，奥尔森对此表示了“大致赞同”。参见张宇燕：《利益集团的鞭挞者》，2002年2月28日《中国图书商报》第12版。丹尼斯·缪勒也认为，奥尔森身处第一代公共选择学家之列。参见 Dennis Mueller, *Perspectives on Public Choi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4.

④ Jac C. Heckelman and Dennis Coates, *Collective Choice-Essays in Honor of Mancur Olson*, 2003, p. 7.

⑤ Mancur Olson and Richard Zeckhauser, “Collective Goods,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Alliance Efficiency”, in Roland N. McKean (ed.), *Issues in Defense Econom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26. 客观地说，布坎南并不否认政府之外的社会集团参与供给公共物品。参见〔美〕詹姆斯·布坎南：《民主财政论》，穆怀朋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0页。

度，奥尔森与布坎南等研究者并无多少不同，但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奥尔森考察的不是政治领域中的公共选择和公共物品供给问题，而是社会领域中的集体选择和集体物品供给问题，“他研究的实体是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利益集团”^①。鉴于奥尔森同其他公共选择学派学者之间表现出的巨大差异，有的研究者根据奥尔森执教的大学名称将其称为公共选择理论的“马里兰学派”^②。将奥尔森贴上何种学派的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奥尔森本人从事的具体研究工作及其学术特色。为了突出奥尔森在集体行动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本书从较窄的意义上将其看做一位集体行动理论家。

集体行动理论是以集体行动的发生、结构和功能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形态，它关注的中心问题是集团成员如何通过集体选择的方式供给集体物品。本书所研究的集体行动理论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理解。狭义上，集体行动理论就是对集体行动逻辑的研究；广义上，集体行动理论还包括对集体行动逻辑的拓展和应用部分。本书是从广义的角度研究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我们可以从理论和应用这两个层面来评价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在理论层面，奥尔森根据理性人假设提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在应用层面，奥尔森依据集体行动的逻辑，广泛地分析了各种政治经济现象，并对利益集团的形成机制、经济增长的原因等问题给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解释。奥尔森最为突出的贡献并不在于他提出了全新的理论，而在于他系统地总结前人有关集体行动的研究成果，提出并利用集体行动理论广泛地分析各种社会现象。

《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和《权力与繁荣》这三部著作代表了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以这三部著作的内容构成和出版时间为参照，可以将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奥尔森分析了集团规模和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比较完整地提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第二阶段，奥尔森将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寻租理论相结合，研究国家兴衰的内在机制，提出了“制度僵化”思想；第

① Wallace Oates, Joe Oppenheimer and Thomas Schelling (2000), “Remembering Mancur Olson”, 2000, p. 798.

② Jac C. Heckelman and Dennis Coates, *Collective Choice—Essays in Honor of Mancur Olson*, 2003, p. 7.

三阶段，奥尔森从集体行动的视角论述了专制政府和民主政府的形成机制，探讨社会繁荣的制度基础，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角度提出了“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思想^①。在第三阶段研究中，奥尔森借鉴了政治学中的国家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制度分析的比重逐渐增多，但奥尔森仍将其建立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之上^②。制度僵化思想和强化市场型政府思想是奥尔森对集体行动逻辑的发展。

1965年，奥尔森的博士论文《集体行动的逻辑》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杰出的著作中，奥尔森将经济学方法引入非市场问题的分析中，驳斥了多元主义集团理论。人们不能从集团具有共同利益的事实，推导出集团成员会采取集体行动实现这些共同利益。利益集团在规模上存在差异，小集团同大集团相比更有优势采取集体行动实现其共同利益，规模庞大、人数众多的大集团往往受制于规模较小、组织有力的小集团。在青年时期的一次欧洲旅行中，奥尔森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德国经济发展蒸蒸日上，而作为战胜国的英国却暮气沉沉呢？1982年，奥尔森在出版的《国家的兴衰》中给出了解答，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和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密切相关。奥尔森将《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的理论分析同东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相联系，从国别比较的视角探讨了国家兴衰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奥尔森指出，在长期稳定的国家内部会滋生出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它们逐渐克服了集体行动的障碍，形成集团网络。当这些利益集团以寻租的方式转移社会资源时，它们就会以狭隘的集团利益取代社会的公共利益。利益集团的分利行为是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滞后的深层原因。2000年，奥尔森的遗世之作《权力与繁荣》出版，他试图寻找出医治集团寻租弊病的药方，并确定何种类型的政府能够创造社会繁荣。奥尔

① Jac C. Heckelman and Dennis Coates, *Collective Choice-Essays in Honor of Mancur Olson*, 2003, pp. 2-9.

② Thomas Schelling, "Forward" to Jac C. Heckelman and Dennis Coates (eds.), *Collective Choice-Essays in Honor of Mancur Olson*, 2003. 在奥尔森的后期研究中，由于深受世界格局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他逐渐将理性分析与制度研究相融合，考察政府转型及其经济效应等问题。1990年，奥尔森接受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助，于马里兰大学创建“制度改革与非正规部门研究中心”（The Center on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he Informal Sector, IRIS）。

森将政治学研究关注的公共权力与经济学研究关注的社会繁荣两个议题相结合，探讨权力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当存在激励促使人们攫取而非创造时，一个国家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贫穷和匮乏；相反，当存在激励促使社会资源流向生产性用途而非掠夺式的再分配时，一个国家将产生大量社会剩余并迎来繁荣和富足。社会的持续繁荣要求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出现，即政府拥有足够的权力界定产权并保证契约的强制执行，但政府又不能拥有过多的权力以至于强取豪夺。

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中，集体行动的主体是个人以及由个人组成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在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公民社会中采取行动，并影响政治过程和市场过程。集体行动理论从消极功能的角度对利益集团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开展了一项富有探索意义的研究。奥尔森一方面指出，集团规模将阻碍人们采取自愿性集体行动，另一方面，他认为利益集团一旦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将会通过影响政府决策、组建垄断组织等方式限制社会经济的发展。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同国内学者从事的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存在很大差异，他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公民社会中的特殊利益集团，更具体地说，关注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社会经济功能。第三部门研究中的“志愿失灵”（voluntary failure）和“集体行动的逻辑”具有理论上的联系。通过研究集体行动理论，人们可以从集体选择的视角把握社团组织形成的微观机制，以及社团组织采取集体行动可能面临的阻力。奥尔森告诉人们，存在于公民社会内部的社会组织既可能是公共生活中的支持性力量，也可能是压迫性力量。公共生活既会受到国家的威胁，也会受到社会力量的威胁^①。为了限制利益集团对社会繁荣造成的消极影响，奥尔森提出了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制度设计思想，这对于转型国家如何以制度化方式限制分利集团、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① 奥尔森曾经以美国作为背景得出结论，即不是联邦政府而是公司、大学等社会组织威胁了自由和平等。参见 Mancur Olson, “On the Priority of Public Problems”, in Milton Moss (ed.),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73, p. 307.

二 研究概述

(一) 国内研究

在国内的中文出版物中,译著《利益集团、院外活动和政策制订》^①较早介绍了奥尔森有关集团政治的研究成果。国内政治学界的学者很可能是通过这部书得以初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的。国内对集体行动理论的关注大约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具体表现为奥尔森代表性著作中文译本的出版,以及研究者发表的系列论文。虽然国内学者对奥尔森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经过10余年的积累,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国内对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对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宏观评介性研究,即研究者以介绍集体行动理论的基本观点为主,附以个人的评论。由于奥尔森是一位经济学家,国内最早对集体行动理论的介绍基本上来自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其中,张宇燕对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引介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宇燕从“制度悖论”的角度解析了集体行动的逻辑:“在既定制度约束下的人的最优行为——即个人理性,并未实现制度理性;其结果并未与适宜制度所对应的结果相吻合。”“制度悖论”现象在大集团中表现为集体物品供给不足,出现集体行动的困境。^②

^① [美] 诺曼·杰·奥恩斯坦等:《利益集团、院外活动和政策制订》,潘同文等译,世界知识出版1981年版。

^② 张宇燕:《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经济研究》1992年第11期。他将奥尔森提出的重要概念“selective incentive”译为“有针对性的刺激”;《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中译本有的地方将其译为“选择性的激励”,有的地方又译为“选择性激励”;而在《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则译为“有选择性的激励”。本书凡涉及“selective incentive”处,无论是使用还是引用,一律译成“选择性激励”。有关集体行动理论的评价性研究可以参见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年第2期;张宇燕:《奥尔森和他的集体行动理论》,载《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店1995年版;杨龙:《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政治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姚震宇:《理性、权力与经济繁荣——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二种类型相对微观化，它是对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杨光斌评述了奥尔森方法论的局限：“在研究方法上，奥尔森试图将个体主义凌驾于一切之上”，他在集体行动理论的论述方式上“犯了范畴性错误”，“以纯粹的理论假设代替了最基本的政治现实”^①。与上述对奥尔森方法论的否定倾向相反，赵鼎新为理性人假设进行了辩护。集体行动理论的分析对象并不是真实的人，而是具有充分信息的理性人。奥尔森在研究中使用了“纯粹的形式方法”，形式模型的主要价值不在于准确地预测事物的具体发展，而在于洞悉事物的“关键本质”^②。国内研究者对奥尔森方法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集体行动理论使用的理性人假设上。理性人假设的意义并不在于其本质的经验性，而在于依据此类假设得出结论的可验证性。由于研究者缺乏对公共选择学派产生背景的分析，对理性人假设缺乏认同，所以，对奥尔森的方法论持批评态度。

第三种类型是对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扩展性研究，研究者依据集体行动理论提出新的分析模型和理论观点，并以此透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大量维权、上访等群体性事件，这为批判性地运用集体行动理论提供了现实环境。于建嵘使用了奥尔森提出的选择性激励的概念，研究农民采取集体行动维护权益的动力机制。于建嵘得出结论认为，集体行动的逻辑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当代农民维权抗争的经验事实。当集团并未形成明确的组织形态时，社会群体中的部分成员为了改变现有政策所采取的集体行

① 杨光斌：《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贡献与误区》，《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有关奥尔森方法论的研究可以参见李炜：《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青年研究》1999年第1期；罗必良：《“奥尔森困境”及其困境》，《学术研究》1999年第9期。李增刚：《奥尔森经济思想评述》，《经济评论》2002年第5期。

②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集体行动理论之所以能够以简约的形式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就在于它对复杂的人性进行了纯粹假定。在国外研究者中，强调情感等非经济因素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并不少见，如瑞兹曼认为，集体行动的逻辑回避了五方面因素：习俗（convention）、道德（morality）、情感（sentiment）、制裁（sanction）和确立规则（formalisation）。这些因素可以丰富集体行动逻辑的内容，但它们“与奥尔森理性选择理论的本质是相容的”。参见 David Reisman, *Theories of Collective Action: Downs, Olson and Hirsch*, Houndmills; The Macmillan LTD, 1990, p. 209.

动,其真正原动力不是集团内部的奖罚分明,而是集团外部的被动压力。^①

总体而言,国内对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关注是比较广泛的。随着奥尔森最具代表性的三部著作陆续翻译到国内,人们开始认识到集体行动理论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解释力。国内学者在一般性地介绍奥尔森学术观点的同时,也着手研究集体行动理论的方法论、集体行动理论与其他政治经济理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国内学者对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有逐渐深入的趋势,但国内研究状况显示出的不足之处也不容忽视。

首先,奥尔森一生中撰写了大量有关集体行动的著述,国内研究者对这些著述的阅读在量上尚显欠缺。奥尔森围绕集体行动的主题写下了多本著作,除了一般学者比较熟悉的《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国家的兴衰》(1982)、《权力与繁荣》(2000)之外,还有《联盟的经济理论》(1966,与泽克豪泽合著)、《北极光有多亮?关于瑞典的一些问

^① 于建嵘:《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机制研究——基于H县农民维权抗争的考察》,《学海》2006年第2期。国内学者在运用集体行动理论分析社会现象时,往往对奥尔森的理性分析持批判态度,这既和研究者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同认识有关,也和中西政治结构的不同特征有关。理性选择革命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当时的政治构架已经成熟,利益集团开始积极采取集体行动参与政治过程。在民主制度的条件下,公民基于个体志愿组建利益集团的合法权利已经得到确认,他们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如何采取理性策略传递利益诉求、影响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与此不同,在尚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民主政制有待完善,政治参与的渠道并不畅通,社会集团的集体行动并未常规化,群体性事件是政治变迁的被动衍生物,它们甚至被视为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社会成本。在分析这些群体冲突现象时,研究者往往选择宏观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分析、制度变迁分析或社会网络分析,而较少采用注重个体经济激励的微观理性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分析方法并非简单的中性工具,它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密切相关。有关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扩展性研究可以参见张宇燕:《利益集团与“贾谊定理”》,《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程虹:《制度变迁的周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此外,集体行动理论还引起了国际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领域研究者的兴趣,出版的相关著作包括: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曾鹏:《社区网络与集体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桑本谦:《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潘伟杰:《制度、制度变迁与政府规制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